



逃犯条例 深度

评论

许仁硕：旧日港警，一去不复返

九七之后，香港警队其实仍然维持了殖民警政体系，只对政权而非民众负责。而在台湾，民主政体下的政党轮替和公民社会的力量，能够对警政体系达成一定的制衡效果。

2019-09-17



2019年9月6日，防暴警察在示威者在弥敦道纵火的现场。摄：林振东/端传媒

即便林郑月娥已经宣布撤回反送中条例，香港连绵数月的抗争仍未停歇，原因之一，就是被港府用来处理抗争的香港警察，自身已经成为了更大的政治问题。但即便面临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危机，香港警察仍旧坚称并未失去长年标榜的所谓“亚洲第一”地位。

如果香港警察还保有自认“亚洲第一警队”的自尊，认为自己有能力也有责任“做个好人”，那究竟局势为何会恶化到这个地步？香港警察，乃至香港社会该怎么办，又能怎么办？以下将爬梳香港警察在97年后错过的几个改革机运，再进而介绍台湾近年的警政改革动向，希望透过他山之石，寻找出一些改变的可能。

被代理的去殖民、被掩盖的警民矛盾

九七之后，北京与香港政府实际上继承、维持了殖民警政体系。这样的“去殖民”，可说是一种被代理、为新政权服务而非为香港人服务扭曲的结果。

已有许多研究指出，在港英殖民时期，特别是在六七暴动之后，香港就已经建置了利于镇压社会运动的法律体系，并授以“皇家”之名以嘉奖“平乱”有功的香港警察。但港英政府忌惮于夹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政治情势，担心高压手段即便合法，引发的政治动荡仍会引来中国介入，因此大多备而不用。

在九七年之后，一方面是当时的北京政府承诺了“五十年不变”，二方面是整套港英政府留下的殖民式警政与相关法制，在北京的统治需求上也是相当实用。讽刺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府虽然打著“去殖民”的解放大旗，例如在六七年时在香港左派扮演要角的杨光，在九七后受到了政府的表扬，但实际上仍是继承、维持了殖民警政体系。这样的“去殖民”，可说是一种被代理、为新政权服务而非为香港人服务扭曲的结果。

但香港警政体系未能去殖民的矛盾，一开始并未被大多数的香港人所意识到。首先是因为在“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之下，“不变”被视为一种正面的、符合香港人利益的目标，因此九七年并不被视为一个改革的契机。其次则是在九七之后，许多人期待日后与中国的经济往来，而未意识到北京政府与香港人间可能会产生的利害矛盾，自然也不会想要去质疑港警

所保持的高度镇压实力。最后则是香港警察常年在公关与社区工作上取得相当成果，廉洁与效能亦是有目共睹，使其在国内外均保持优良形象并受到信赖，即便有社运人士指出警队弊病，也难获得社会广泛支持。



2005年12月5日，反世贸示威中，来港示威的韩农与香港警察爆发冲突。摄：Mike Clarke/AFP/Getty Images

例如在2005年香港主办WTO部长级会议时，各国运动者也赴港进行示威，特别是熟习各种非暴力抗争技巧的韩国农民，带给了当时的香港社会与港警相当的震撼。在以消防水柱、胡椒喷雾、催泪弹与布袋弹对抗之后，港警拘捕了数百名抗争者，当中包括一名国立台湾大学学生李建诚。

令当时亦就读台大的笔者印象相当深刻的是，当声援者在台大门口举行集会，要求释放李建诚的同时，也有许多人，特别是来自香港的同学批评，香港的警察与司法都比台湾要公正许多，认为声援者是小题大作。

而港警在2005年WTO会议时的作法，不只在当时，至今亦被视为一个“成功案例”。无论是1967年“暴动”时的香港警察、在其后三十年间不断强化社会控制能力的皇家香港警察，或是在2005年香港街头使用的催泪弹、胡椒喷雾、消防水喉跟布袋弹，似乎尚被“往日美好优秀的香港警察”情怀所包裹，成为缅怀而非检讨、反省的对象。

在体制转换之际，本是盘点积弊，反省历史，改革体制的契机。然而在“被代理、以北京利益为导向”的去殖民历程中，警政体系的改革并未进入议程当中，作为部分民主社会中的殖民式警队此一矛盾，就此被保留下来。实际上，“不变”的警察体系即便展现镇压能力，也仍旧受到大众支持，就此错失了第一波改革的机会。

而后，虽然中港矛盾隐隐在香港社运议程中浮现，例如反国民教育科运动，就是北京政府希望强化意识形态控制，造成香港反弹的结果。但当中港矛盾加剧时，香港警察与香港公民可能随之浮现的矛盾，仍未为香港社会所广泛认知。

2013年时，笔者赴香港报告对于台湾警察如何处理抗争的研究，作为研究者，自然也提出了一些台警执法上出现过的问题，例如行使强制力时缺乏法源依据、现场员警遮盖编号导致究责困难、对政治立场不同者差别待遇等等。当时一位资深的香港高阶警官对笔者说，从我的报告看来，他认为港警的法治传统与专业度均比台警优秀许多，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他有自信港警在九七后，仍足以长久守护香港社会。

而当时另一位与会的香港民间团体成员则表示，他不明白为何台湾抗争者会需要与警方冲突，在香港只要愿意谈，警察都会做好妥善安排，香港人上街也不会与警察有冲突，比台湾人成熟、理性许多。

就笔者在数年赴港交流经验的观察，每年对六四的追思活动，到挡下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乃至于刚阻止了国民教育科的成功经验，似乎让当时的许多香港人，即便对政府有意见，也对“和理非”路线充满自信。在这股自信之下，即便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也可见如上述般对韩国、台湾的抗争经验，以及与警察间的对抗关系缺乏理解，甚至轻视为后进国的情形。

确实在当时港人以“和理非”为主流的抗争型态下，港警确实并未强势以对，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同时在港警的价值观中，也以能柔性处理抗争为荣，并标榜为九七后港警的政治中立、法治传统与专业并未动摇的明证。因此在抗争者与港府，乃至于港警间未曾发生过高度政治紧张的情况下，殖民警政的矛盾持续被掩盖，各方都相信香港警察仍是，且永远会是“亚洲第一”。



2014年12月1日，雨伞运动中，警察在金钟拘捕示威者。摄：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但这样的局面，很快地就被北京政府打破，人大释法对于普选问题的直接介入，加上港警对和平示威者发射了大量催泪弹，引发了连绵数月的雨伞革命。港警的执法过当问题，以及作为其背景的殖民性警政体系，开始渐为香港社会所认知。

2017年，香港警察在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俗称O记）下增设了专门处理集会游行的D组，将社会运动当作组织犯罪来处理，在反送中期间的数次拘捕，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雨伞之后，笔者在一场国际研讨会上，曾向港警的资深警官请教他们在雨伞时使用催泪弹的决策理由。该警官告诉笔者，当时前线受到抗争者的激烈攻击，而且他们有情资显示，有许多国外的激进抗争份子，在当时已经潜入香港。因此警队必须自保，动用催泪弹是出于专业判断下采用的适当武力。

“所谓受到激烈攻击，请问当时抗争者是以什么样的武装攻击警察呢？”“雨伞，几乎所有抗争者都拿著雨伞殴打或是投掷前线警员。”“那认为催泪弹是适当武力的理由是？”“催泪弹能立即瘫痪群众的行动，但又不会留下任何伤害，让警民双方都不至于在冲突中受伤。外面对于动用催泪弹的指责，都是些缺乏专业的外行话。”

而就在该场研讨会上，笔者亦目睹了港警与台警的一场争论。当时与会台警首先发言表示，台湾处理抗争均是以柔性为原则，不会像香港在雨伞时一样，动用催泪弹、胡椒喷雾等化学武器强硬镇压。这番发言引来在场港警不满，立即反驳指催泪弹不会对人身留下任何伤害，是较警棍更为温和的适当武力，反而是台警在太阳花中使用的水炮车，由于难以控制轻重，范围又广，才真正是会伤人的过当武力，双方相持不下。

实际上，无论是催泪弹或是水炮车，都有可能伤及抗争者，也都有致死的相关案例，并无何者一定比较“适当”的问题。例如在韩国1987年的运动中，大学生李韩烈被催泪弹击中死亡；而在民主化后，韩国虽禁用催泪弹，但改用水炮车，2015年时农民白南基，就在抗争中死于水炮之下。讽刺的是，主张“不应使用化学武器”的台警，仍采购了辣椒喷雾作为警

方的新装备，但鉴于香港雨伞革命的经验，附带了“不得用于抗争场合”的决议。而批评台警水炮车“太危险不专业”的港警，则重金购入了水炮车，已于日前推上香港街头。

从前述港警的发言可以得知，即便受到外界猛烈质疑，自豪的“柔性、和平”也已荡然无存。历来的“亚洲第一”自信，仍让港警能对执法行为高度自我正当化，将批评均化约为“缺乏专业”所致，甚至对台湾同行悍然反击，因而失去了在冲突后进行内部反省、改进的可能性。而在香港的现行体制之下，除了对少数证据确凿的个案（如七警案）能有一定制裁外，民间要推动警队的制度改革，亦属相当不易。



2019年8月25日，有市民不满港铁封站的安排，并在荃湾站及葵芳站与港铁职员理论。在葵芳站，警方一度到场协助港铁职员落闸。摄：陈焯辉/端传媒

不过，要说港警在雨伞后并未改进，也不尽精确，只是方向上并非朝向“改善执法过度强硬，务求保障人权”，而是“强化镇压能力，有效瓦解抗争”。在硬的一手上，港警在装备、人员、编制上持续强化对抗争的部队，例如机动部队（PTU）的编制其实一直在增强。2017年更在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俗称O记）下增设了专门处理集会游行的D组，将社会运动当作组织犯罪来处理，在反送中期间的数次拘捕，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对一般基层员警也在训练上，相当扎实地模拟各种新式抗争手法，提高员警的应变能力。

而在软的一手上，由于港警将“青少年与警队关系的疏离”，认定为雨伞中年轻人上街抗争的原因之一。因此依循著六七年后设置少年警讯，拉近警民关系的成功经验，希望透过经营社群媒体、增加少年警讯的资源与活动等，重新培养香港年轻人当中的亲警风气，瓦解未来抗争的动员基础。

爬梳至此，再对照反送中情势，可以说缺乏民主制衡下的港警“中立、专业、法治”神话，其缺陷已然相当清楚：在殖民时期以“不左不右”为政治中立准则的港警，背后的潜台词是“绝对效忠政权”，但政权又从不是香港人的政权；而所谓专业，指的是手段上的效率、准确，但单以专业并不足以正当化警队作为，必须先问欲达成的“目的”究竟为何，毕竟许多独裁国家的警队，在镇压异议方面都是相当“专业”的；至于法治之所以能够保障人权的前提，不只是警队受法律拘束，法律本身也需掌握在公民手中，否则公民就成了被政权乃至警队“依法治理”的客体，任人宰割。

虽然缺乏民主，在制衡警察权力上是严重缺陷，但并非有了民主体制，警察权力就会自动受到制衡，仍须回到各种具体的场域上进行制度角力。从以下在太阳花运动后的台湾警政改革经验，虽然未竟全功，相信仍能提供香港一定程度上的参考。

太阳花后的台湾警政改革

台湾警察虽然也有港警的催泪瓦斯枪，但由于担心影响民众，长年以来备而不用，显然是对雨伞革命所引发的台湾舆论有所顾虑。

与雨伞革命类似，在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中，由于警方在3月23日占领行政院的动作中，动用了镇暴部队与水炮车，对在行政院当中静坐的群众进行流血镇压。因此即便是在立法院占领本身结束后，原非运动焦点的警政问题，也成为了许多运动者持续关注的议题之一。



2014年3月24日，太阳花学运，防暴警察在台湾行政院外使用水炮驱散示威者。摄：Lam Yik Fei/Getty Images

站在运动的角度看来，“问题”是全副武装的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抗争者，明显执法过当，要如何究责与防止再次发生的问题。但台湾警方至今仍坚持当晚只是“遇强力抵抗，彼此肢体强烈接触，架离时难免受伤。经放大播放后，警察形象频遭导误”而已，因此“问题”反倒是警察执法太过软弱，才无法阻止政府机关遭到占领。

在上述截然不同的问题意识之下，在太阳花之后，有许多与抗争相关的警政议题上均产生了警民双方的角力。首先是在第一线的器械方面，台湾由于过往戒严统治的关系，民主化后仍延用军事防御用的带刺或刀片的金属拒马、蛇笼，作为阻隔器材，而非单纯的金属或灌水栅栏（香港称“铁马”、“水马”），许多台湾抗争者都有被拒马刺伤的经验。在太阳花后，警方为防止占领再次发生，原本在抗争前才会出动的上述器材，均常备于主要机关出入口，以便迅速部署，部署时的密度、高度与数量也大幅提高，被称为“台北拒马大展”。

在2016年政党轮替后，民进党立委在立法院批评警政署，不应沿用军事戒严时防卫警政机关的准则，把人民当“敌人”来部署会伤人的拒马，警政署随即撤去两年来部署在各机关的拒马阵。而后则改以较低矮、不带刺的金属栅栏（铁马）区隔，并增加第一线警力的人数，以防抗争者越界。然而，台湾人并未就此摆脱带刺拒马，例如在2017年的反年金改革抗争、2018年的反劳动基准法修法抗争中，民进党政府亦让“台北拒马大展”再度重出江湖。

而在前面提过的辣椒喷雾，原先是2014年9月时，由国民党立委提案新增为警用配备。但消息见报没几天，就发生雨伞革命，因此警政署长在10月时于立法院表示，目前警用装备足以应付聚众事件，不需另购喷雾。署长另外指出台湾警察虽然也有港警的催泪瓦斯枪，但由于担心影响民众，长年以来备而不用，显然是对雨伞革命所引发的台湾舆论有所顾虑。直到2016年11月，警政署方以打击犯罪为由，新增辣椒喷雾为警械，但禁止于抗争场合使用。

至于在2014年太阳花中被用来驱散群众的水炮车，在同年4月的反核游行再次上场，但这次是对著在道路上，已被警方团团包围的静坐民众射击，近乎行刑式的作法引起公愤，就再也没有动用过水炮车。而在一场与人权团体的座谈中，与会的高阶警官表示，这是因为当

时舆论反弹过大，因此警政体系内部决定不再轻易动用水炮车。另外也新制定了“警察人员使用高压喷水车应行注意事项”，解决了过往缺乏规范的问题，希望民间安心。

该份“注意事项”在人权团体持续要求下，终于在今年7月公开，但当中仅抽象要求“依比例原则，审慎选择适当方法，合理、合目的执行”，难以约束实际的滥用行为。而所谓顾虑民意反对下的“不轻易动用”，也均系于警政长官，或是政府高官的一念之间。且政府仍在2016年编列预算，购置了新的水炮车，显然并未放弃。

而在法制方面，自1987年解除解严以来，为了控制群众运动，另外订定了“集会游行法”来进行管制。在威权背景下，该法的内容绝大部分均是对集会游行的介入以及处罚，并且给予警察相当大的裁量权限，长年来为人权团体所诟病。除了持续推动修法外，该法的部分条文也曾两度被大法官宣告违宪。

从台湾的经验可以看到，民主政体下的政党轮替，以及公民社会的力量，确实能够对警政体系达成一定的制衡效果。

在2016年民进党首次取得行政与国会多数下，原本认为集会游行法修法应该终于能有进展。然而在警政机关以“安全考量”为由的强力反对，以及开始作为执政者面对抗争的体验之下，民进党虽然仍有修法意愿，但在部分条文的立场转趋保留，表示希望主张修法的人权团体，可以信任民进党不会滥用权力，能够同意还是留给警察较大的权限。最后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修法又再次搁置至今。

最后在2017年召开的“司法改革会议”中，决议应成立有外部委员加入，具独立性的“警察教育委员会”与“警察专案与绩效管理委员会”此一决议不仅是希望从根本上改善不当执法的问题，更希望全面地从教育与管理两个层面切入，检视当前的警政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决议的推手之一，正是在太阳花运动后成立的“台湾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警工会）。

该会是发端在太阳花后，由社运人士发起的“支持警察组工会”运动，目的希望基层员警能站出来争取自己的劳动权益，并透过工会开启警察与社会沟通的可能性。该会会员目前以

现职员警为主，除了争取警员的劳动权益外，也关注警政民主化改革议题，致力于寻找员警权益与公民社会的交集。目前除投书报章外，也持续与人权、司法改革等社运团体合作推动警政改革，并开办与警政议题相关的调查、讲座等等。

可惜的是，前述决议在警政署的杯葛之下，仍未能完全落实。警政署坚持在治安考量下，教育与绩效制度均应由警政署主导。因此在绩效方面，仅愿意自行邀集专家学者与警员代表举行座谈会，检讨相关议题。在教育方面，则自行聘任任务型的咨询委员，但不称委员会。行政院虽一再要求，民间也不断批评警方违反司法改革会议决议，但实际上仍拿警政署没有办法。

从上述台湾的经验可以理解到，民主政体下的政党轮替，以及公民社会的力量，确实能够对警政体系达成一定的制衡效果。例如收起带刺拒马、延后采购辣椒喷雾（并承诺不用于抗争场合）、避免使用水炮车、启动集会游行法的修法程序、通过警政改革决议等等。

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警政体系对执政者的警政政策都有著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能以消极抗命的方式，实质杯葛政治部门对警政的改革决策。而因政治考量而一度收敛的警察权力，长远来看仍会在社会不注意时，持续储备力量，一旦政治情势转变，随时有可能死灰复燃。

民主与法治都能让公民的筹码变多，若政党成功轮替更是会制造出许多机会，但从从不包赢，这是一场永无止尽的拉锯战。



2019年8月24日，“燃点香港，全民觉醒”的观塘游行，游行后警民爆发多轮冲突，警方密集开枪，发射多枚催泪弹、橡胶子弹、海绵弹和胡椒球。摄：林振东/端传媒

挖掘香港警政改革的可能性

香港警察的克制，在港英时期是国际情势与殖民政府统治考量下的产物，在九七后则立基于各方对“五十年不变”的共识，以及以“和理非”为主流的香港社运，这些条件在现在都已不再存在。

回到对香港局势的展望，香港人首先要认真面对的，是无论主观上如何希望“找回旧日港警”，都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也不该回去了。确实对现状的不满，自然会带动怀旧情绪，但并不代表主观上的美好旧日，真的就是应该追求的未来。毕竟，今日的铁腕镇压，其实在数十年来一直有迹可循。

香港警察的克制，在港英时期是国际情势与殖民政府统治考量下的产物，在九七后则立基于各方对“五十年不变”的共识，以及以“和理非”为主流的香港社运，这些条件在现在都已不再存在。必须认清的是，无论影视作品中的港警再帅气，日常遇到的警员多帅多美多有礼貌，港警从未真的属于过香港人。香港人的警察不在过去，在未来。接下来的功课，跟所有国家一样，是如何有效约束警权的难题。

至于该怎么做，在目前对“黑警”的群情激愤下，可见到许多意见是希望将警队换血。但不得不说接下来香港未来的政治情势，即便五大诉求全数达成，仍很可能会是在特区体制下的部分民主，警队大换血的可能性相当低。

比较务实的做法，是一方面进行独立调查，对应责任者做出适当的人事和司法处置，对警队内外明确传达改革的讯号，防止再犯并重建信任。另一方面则从警队相关的法规、教育、人事、监察制度著手，从根本上改变警队的体质。而这样的“换血”，即便顺利启动，仍非短时间能够办到的，再不情愿，也都得要有比气长的准备。

之后港府政改会如何发展，是否会出现有利改革的政治环境，目前难以预测。但从公民社会角度出发，若想达到以上的目标，除了已被提出的独立调查与拯救义士外，仍有许多明确能做的事情。

首先是意识的建立，如果香港社会继续沈溺在对往日港警的美好迷思当中，则警察改革的必要性将难以被广为认知。最坏的情况，是港警在运动局势趋缓后，成功以公关手法与社区工作重建香港市民的信任，令抗争者在社会上遭到孤立。在当前的危机当中，如何将香港市民对警察暴力的愤怒，转成港警改革的意识与关心，并将其导入长期的政治议程当中，会是重要的倡议目标。

其次则是监察与改革所需的研究工作，由于警政面向相当繁多，魔鬼往往藏在细节里。要防范的，不只是紧急法等显眼的大动作，还有在看不见的地方，例如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的预算案中，是否又加强了对付社运的警力，或是又买进了最新型的武器。或者是日常当中，港警是否强化了对社运人士的情报搜集力道，甚至开始应用各种理由进行监视、骚扰。要先有能够长期洞悉、追踪警政政策动向的人力与知识，才有可能进一步推动社会普及与宣传工作。

而除了在警政制度面的长期倡议与运动之外，关于警察与社会运动的记忆政治问题，也值得民间关注。就算是在当下，“真相”也经常是暧昧不明的，在这段抗争期间里，不同媒介是如何映出不同的样貌，香港人应当有切身的体会。更遑论随著时间渐长，若让官方建制渐渐掌握住对反送中运动的话语权，那么这场运动的意义恐怕反而会从改革的契机，扭转成巩固警权的正当性来源，这才是真正被“暴动定性”的危险之所在。至于权力者能扭曲一场镇压至何种地步，长年纪念六四的香港人，应该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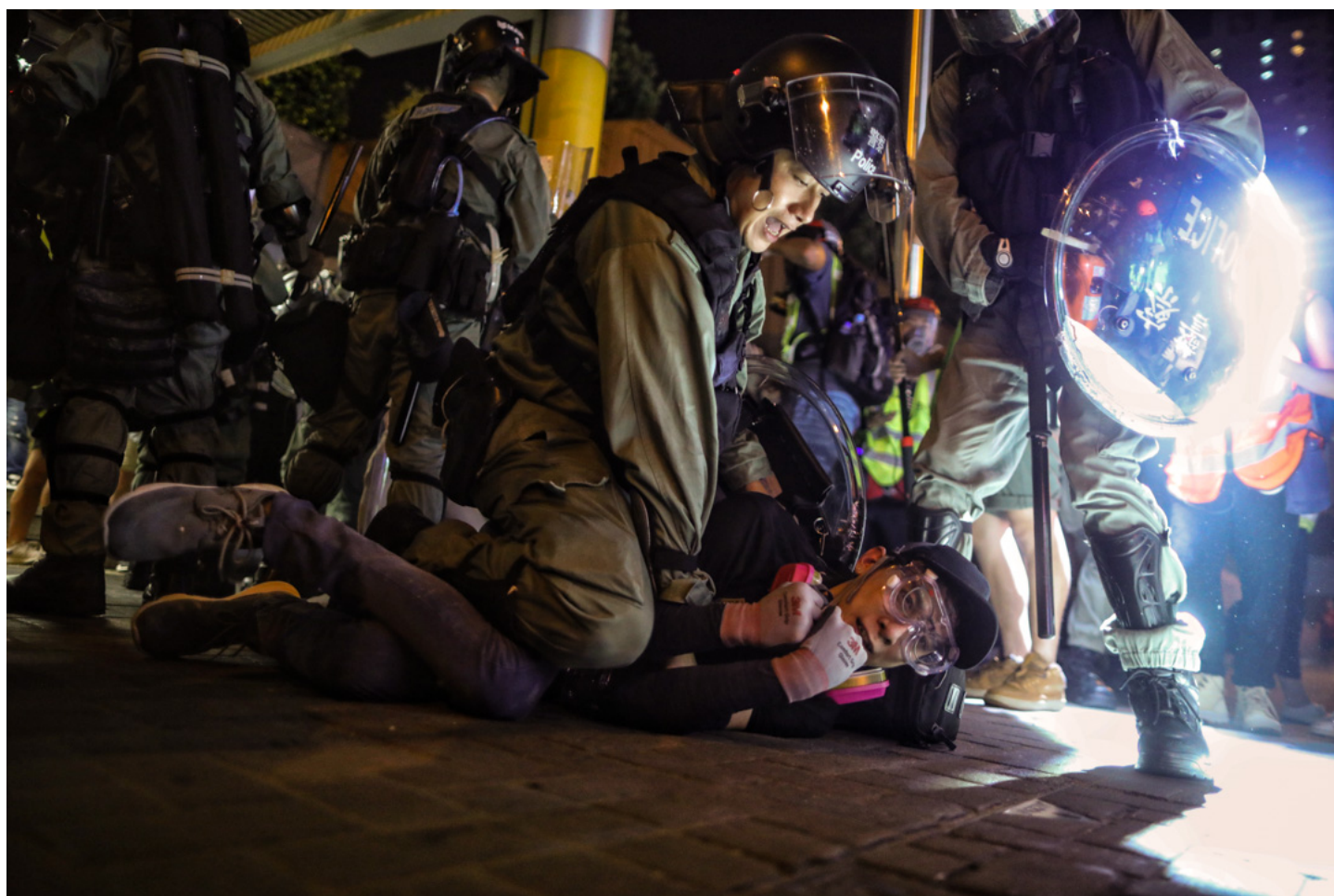
另外有许多人都在问，面对当前警队的问题，除了以协会名义出面痛骂抗争者为甲由（蟑螂）外，警队内部难道没有不平之声？香港社会又该如何看待个别员警？日前开始有退职员警与警眷出面发声，更引发了相关讨论。

若站在警员的角度思考，首先在警校的教育中，强调服从是第一要务，并不鼓励独立思考，警员缺乏反思、批判性的思想基础。而即便对目前的做法抱有疑问，在警队中也无法说出口，更遑论寻找伙伴，是相当孤立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虽然香港警察在制度上仍维持了相当的殖民特色，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在人员上已大部分均由香港本地人任职。这强化了香港社会与港警的

连结，一定层面上增加了港警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蕴藏著改革的可能性。当警民关系恶化，警察于公于私都会在本本地社会中遇到许多困难，更遑论一场卷动大半港人的运动，三万港警的亲人朋友，多少都在其中。

目前较常见的是个人断绝往来，网路上四处可见与从警的亲朋好友绝交的文章，甚至公开揭露员警个人信息，在网路上围剿等等。或者是以道德劝说的方式，希望警员良心发现。这虽然能够对个别警员产生压力，但若未提供一个建设性的出口，持续从外部施压的结果，就如北风与太阳的故事般，恐将反而让大多数警员更加依赖警政体系，或者仅会有少数人选择挂冠求去一途。



2019年8月24日，“燃点香港，全民觉醒”的观塘游行，游行后警民爆发多轮冲突，警方拘捕示威者。摄：陈焯煊/端传媒

若站在警员的角度思考，首先在警校的教育中，强调服从是第一要务，并不鼓励独立思考，警员缺乏反思、批判性的思想基础。而即便对目前的做法抱有疑问，在警队中也无法说出口，更遑论寻找伙伴，是相当孤立的。道德劝说、人际压力或是舆论批判，其实是很难帮助有心员警采取行动的。

就此民间可以做的，是试著寻找从警察立场出发，与公民社会有所交集之处，例如台湾的运动者在太阳花后提出，政府不愿解决政治问题，却长期动用大规模警力镇压社会运动，对警察的劳动权益也是有害的。或是有许多美国警官反对联邦政府强力取缔移民的政策，未必是出自人权立场，而是不希望因此破坏与当地移民社群的关系。在找到交集后，进而提供安全的窗口、管道，让有不同想法的警员能有机会先试著说出自己的想法，与外界以及有相同想法的警员进行交流，这就踏出了第一步。

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集会游行权特别报告员Maina Kiai，在去年访台之际，曾对此一问题提出了分阶段性的实作建议。Kiai指出，即便个别员警直接违抗违法命令，在理论上可能合法，但考虑教育背景、公务员的服从义务、集体压力等因素下，期待靠个人抗命来阻止组织性的违法行为，并不切实际。

但Kiai也强调，公务体系内部的“吹哨者”（Whistleblower），对于阻止不法行为相当重要。因此Kiai建议，最理想的作法，是警察自己团结起来，以工会等组织名义直接发出声明，甚至采取集体行动；若难以组织，则作为个别当事人，透过媒体匿名发声；若个人出面风险还是太高，则将信息提供给外界，如人权组织等，由其代理发声；若仅是提供特定个案信息就可能曝光，则至少将制度性问题以及改善的方向提供给外部团体，作为未来警政改革倡议的基础。

在制度上来说，香港的政治制度是部分民主，加上殖民式的警政体系，在改革上确实会碰到许多阻碍。但制度上的不利，是有可能透过公民社会的努力，以及社会运动所创造出的时势来补足的。

以目前香港的情势来说，警政出现问题这点，已前所未有地广为香港人所认知，为未来改革打下支持基础。而以香港公民社会与学界的活跃程度而言，也有充分的资源可以投注至

警政改革。最后则是长年强调服务、专业、克制的香港警察本身，由于这数月来的作法，实在偏离以往所宣称的港警信条太远，感到犹豫、挣扎、困惑的警员想必并不在少数，毕竟除了赚钱，大部分人也希望自己的工作，同时是被社会尊敬的。

警察体系始终是社会的一部分，而非外于社会的他者。即便警政高层自以为是超然而不受拘束的公权力，公民社会也不能忘记这点。面对不义，固然不应乡愿地姑息，但也不要轻言放弃对话与和解的可能性，这看似绕了远路，却是条所有经历过不义历史的社会，不得不走过的一段历程。

（许仁硕，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法研所，现就读于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研究科）

评论

许仁硕

香港警察



热门头条

1. 抢滩越南，大陆商人被台商抛在身后
2. 刘锐绍：林郑的“撤回”与辞职传闻都只是缓兵之计
3. 831晚太子站内发生了什么？还原警察无差别追打乘客事件
4. 早报：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敢于斗争、长期斗争
5. 猪哪儿去了？非洲猪瘟一年后
6. 老年人公园相亲角：性、户口、房子与无处安放的爱情
7. 9.8美领馆请愿：集会提早结束，示威者破坏多个港铁站，4站关闭，多区警民对峙延至午...
8. “人民币台币港币都想赚”，当台湾奶茶遇到政治表态
9. 总编周记：在香港，我开始闻到“二二八”的恐怖烟硝味
10. 香港人是中华民国的什么人？港人赴台寻求“政治庇护”的两种模式

编辑推荐

1. 许仁硕：旧日港警，一去不复返
2. 李立峰：市民如何看待示威者与警方使用的武力
3. 香港人是中华民国的什么人？港人赴台寻求“政治庇护”的两种模式
4. 叶静伦：香港街头的“阵地社工”，如何突破“社工只是做爱心”的刻板想像？
5. 第76届威尼斯影展探讨：“小丑”夺狮，影展的功能被消解了吗？
6. 伤感的点唱机 – 再看Robert Frank镜头下的另类美国图腾
7. 古巴粤伶百年浮生录

8. 美呔烤鸡串：矿业小镇上，串不尽的过往岁月
9. 专访刘细良：中港是命运共同体，是我们那一代最错误的信念
10. 丘伟荣：宗教遭遇民主化，希盟时代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的博弈

延伸阅读

皇家警察的最后一夜：也无风雨也无晴

《皇家香港警察的最后一夜》早于2002年就拍摄完成了，尘封中跨越了2003年反对23条立法七一大游行到2014年占中运动这段峥嵘岁月，十余年后才得以面世，却如此一下子切入现实，就像是讲述我们一段经历的前世今生。

揭仲：解放军进香港“维稳治乱”的设想和代价

但当抗争人数动辄数十万，武装部队与港警又缺乏足够法律依据与设施，来长期拘禁抗议人士的情况下，轻率动用武装部队是否真的有能力迅速平息抗争？

萧仁豪：反修例运动中，卧底策略的三大得失

谈到职业伦理、警民互信，那么这个问题不论在哪里，都仍会有其共性，仍然是职业人士需要自持的事情

许仁硕：对警方究责的艰难——太阳花后的台湾经验

就目前而言，台湾经验远远谈不上成功典范，但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内自省。